宋朝刘松年所作的《博古图》：在葱郁浓密的松林中，几个文人墨客正在把玩古董。

# 宋人擅审美，凭什么？

宋朝国力疲弱，打输了要赔款，打赢了也要赔款，却创造了艺术水平的高峰，文学、音乐、美术大师辈出，穿越者都把第一目的地放在了宋朝，为什么？

文／伍子期

农历辛丑牛年第一部爆款的电视剧是一部穿越回北宋的《赘婿》，剧中人物的家庭背景是江南一家从事织布业务的商人。事实上，宋朝成为电视剧的宠儿要从2018年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开始，2020年的宫廷剧《清平乐》也延续了宋代精致、沉静的人文风格。

早在2017年，《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做过一期深度文章，开题是“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原因很简单，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宋太祖赵匡胤从黄袍加身开始建立宋朝，结束了五十多年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随后他又先后统一南方多个小国，之后收复北方，建立了自唐朝以来又一个大一统政权，宋太祖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虽然把南唐付之一江春水向东流，但总体来说，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强大，钱钟书先生甚至笑话宋太祖所言为“仲夏夜梦”，甚至认为南宋那张“卧榻”已经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了。

然而就是在这种“大一统、大抱负”却“小疆土、小朝廷”的矛盾复杂作用下，宋代的艺术水准迎来了一次爆发，形成了理想与现实、大俗大雅共存的理想生活状态。

宋朝的国势疲弱，主要体现在军队战力不足上面，但比起周边国家的经济而言却遥遥领先。所以在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时往往会出现“打输了就赔钱，打赢了也赔钱（澶渊之盟）”的奇怪局面。即使是在北宋文艺人才最鼎盛的庆历到元丰年间（1041-1085），也没有像西汉赋家或者盛唐诗人所表现出来的开阔、恢宏气象，所以，宋代的文艺更重视表达内心和自我，偏向了务实。

尽管史学家们一直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代，但宋人却最先提出了士农工商皆本业，并通过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让更多非门阀子弟得到了受教育和从政的机会，推动了士大夫阶层的强势崛起。同时，宋朝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非农业税所占比重超过农业税的情况。非农经济的繁荣首先体现在科技水平上，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美国学者都若贝谈到宋神宗时期，中国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在北宋出现的。

非农经济的繁荣，供应了北宋庞大的国力支出，既要供养军队，又要安抚周边国家，同时也让统治阶层少了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动力，促进了享乐主义的抬头；有了经济基础，推动了文艺水平的提高。自从《诗经》以后，中国的文艺就是为了服务统治阶层的，服务统治、歌功颂德成了文艺的重要任务。中国历史上唯一实现大一统的职业军人是宋太祖，但他的后代却是把尚武的精神丢了个干净。到了宋徽宗时期，他已经不能满足被文艺服务，更是自己亲自上手，把皇家文艺水平，尤其是绘画、书法和陶艺等提升到了历史性高度。

有了经济基础，让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更重视现实利益，在文艺层面上则是开始反思自晚唐到五代十国以来的华而不实的文风，所以宋代的文艺提升是从文学开始的。唐宋八大家中，北宋独占六位，主要的成就就是继承了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让文学作品言之有物、服务现实需要。北宋务实复古的文风自范仲淹、欧阳修等发端，到苏轼集大成，形成了北宋风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范仲淹、欧阳修，还是三苏父子，都不是出身于传统的贵族和门阀阶层。更难得的是，即使到了南宋小朝廷时，还是涌现了辛弃疾、岳飞、陆游等南宋风骨文风。

经济有底气自然衍生出文化自信。《东周列国志》第三回，施伯曰：“欲人勿恶，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陈寅恪先生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所以可以看到，即使在战场和外交上，辽、金和西夏打得北宋抬不起头，在文化上却一直乐于效仿。

非农经济繁荣带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消费的增加。唐代长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现鲜明。宋代的开封、临安却没有分隔整齐的坊、市，而是一种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相互混杂。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艺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舍、勾栏中展现雏形。被后人喜闻乐道“看过宋朝的夜市，就不再贪恋唐朝的繁华”，足见宋代夜市之繁荣。夜市的繁荣刺激了消费，消费的主力阶层除了商人，还有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之间

的唱和直接带动了北宋的音乐和宋词的繁荣。

宋词的繁荣自不必赘言，宋词既摆脱了唐以来“诗余”的尴尬地位，同时也将五代以来尤其《花间集》题材的局限性拓展开来，其中既有凄凄婉婉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有关西大汉手持铁板高唱“大江东去”。

声伎之乐从来都是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宋代很多宋词大家同时也都是音乐大家。《宋史·文苑传》记载，词坛大家周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南宋大词人姜夔则在《长亭怨慢·小序》中云：“余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还有一位音乐大家可能会出乎大家意料，就是苏轼苏东坡。苏轼的词风虽被奉为豪放派鼻祖，但其涉猎之广泛也众所周知。他在《与朱康叔简》中说，“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尝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义。”证实苏轼在保存原不入乐的诗篇的固有精神风貌的前提下，赋予了经典诗篇以音乐生命。

《妆靓仕女图》，宋朝苏汉臣。

而在文学爆发的推动下，宋的书法、绘画、陶艺和雕刻等艺术也呈现出繁荣的态势。苏轼的绘画素有“士大夫画”之称，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他提倡“画以适吾意”，在其《枯木怪石图》中，他以旋转笔锋绘制一块怪石，几簇焦墨细竹，右侧则有一段枯木，情景怪异。

同时，他的《黄州寒食诗卷》书法（《寒食帖》），用笔或清俊劲爽，或沉着顿挫，字体由小渐大，由细渐粗，有一种徐起渐快，突然终止的节奏，虽是行书，却无一荒率之笔。同为书法大家的黄庭坚跋盛赞此卷于诗胜过李白，于书兼有唐、五代诸家之长。苏轼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又说：“天真烂漫是吾师。”由此可见，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无论是诗词文章，还是书法画卷，都是自己内心的写照，只是不同侧面而已。

北宋的雕塑也和汉唐不同，雕塑从神像向人像快速过渡，不同于汉唐雕塑的大气粗犷和豪迈，北宋的雕像已经与现实中的真人无异，昭示着由士大夫阶层的个人意识的觉醒也带动了平民阶层个人意识的抬头，统治者也开始调整治民思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总结宋朝时提出，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可以归纳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直接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端。

后世常有人质疑宋代的文艺没有真实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真正情景，明明积弱的国力，疲软的对外征战，鲜少在文艺上有所体现。对此钱钟书先生表示，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

即钱钟书先生认为，文艺作品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反映现实的方式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强烈而又深远的效果。但文艺作品不同于真正的历史，文艺作品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历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在史书上是否“有信可征”这一点来判断文艺作品的价值，那就仿佛从X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和雕刻一样没有意义。





# 数学、常识和运气

## ——数学家如何征服华尔街

华尔街鲜为人知的量化投资大师，凭借数学征服了华尔街，这不是穿越小说，而是真实的个人传记

文/梅丽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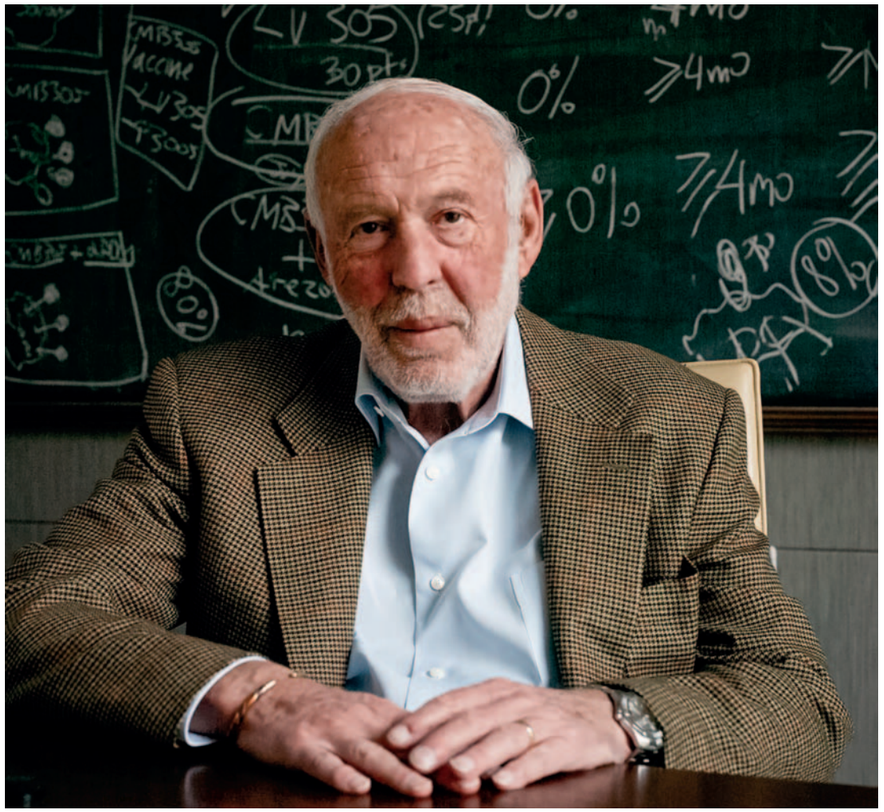
图/视觉中国

数学家曾被《华尔街日报》评选为全世界最好的工作，也曾经有人跟笔者开过一个玩笑，“当数学家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失业了”。

但这个玩笑放到华尔街就是一段活着的传奇。有一只在动荡的2020年取得全年回报率76%的基金——如果你觉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毕竟2020年很多人在A股市场实现了几倍的增长——那么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到1988至2018这30年间，如果有一只基金获得了年均39.1%的净收益率，费前的数字则高达年均66%，且费前收益率没有一年出现过亏损，在这30年的市场交易中获得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利润。读到这里，你一定会觉得能做到这件事的无非就是那几位投资大师。猜猜是谁？

不用猜了，不是巴菲特，也不是索罗斯，而是一位名叫詹姆斯·西蒙斯的数学家成立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旗下的大奖章基金（Medallion）。与做宏观投资的索罗斯和做价值投资的巴菲特不同，作为量化投资先驱之一，西蒙斯和他的团队证明了量化投资也能在投资领域获得巨大成功。尤其是在次贷危机爆发的 2007年，该基金的回报率仍高达 85%。2014年7月的《纽约时报》用“探索者（Seeker）、行动者（Doer）、奉献者（Giver）、思考者（Ponderer）”四个词来形容西蒙斯，为他的一生写下注解。

最近，由《华尔街日报》资深专栏作家格里高利·祖克曼撰写、湛庐文化出品、天



詹姆斯·西蒙斯。

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征服市场的人：西蒙斯传》，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一向以低调和神秘著称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创始人西蒙斯，是如何从一名数学天才成为量化投资大师的，关乎数学，关乎常识，关乎运气。

西蒙斯 1958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1962 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数学中的“陈-西蒙斯形式”就是以陈省身和他的名字命名的。1976年，西蒙斯摘得数学界的皇冠——全美维布伦（Veblen）奖，其个人数学事业的成就也就此达到顶峰。之后，西蒙斯转入金融界，于1978 年开设了私人投资基金 Limroy，五年后率领数学、物理学、统计学团队创立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并推出公司旗舰产品——大奖章基金（Medallion）。西蒙斯领导Medallion对冲基金会以电脑运算为主导，运用数学模型在全球各种市场上进行短线交易。

西蒙斯讨厌抛头露面，被祖克曼描述成一个“黑帮老大”，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雇员们也尽量避免被任何媒体曝光，也极少参加行业会议和公开聚会。不过祖克曼也不是省油的灯，还是凭借他高超的沟通技巧以及一些“运气”，得到了和西蒙斯面对面沟通以及深入交流的机会。

事实上，西蒙斯从来没有上过正规的金融课程，也没有很积极地学习商业知识，40岁时，西蒙斯还只是初涉资本交易而已；10年之后，他在这方面依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更过分的是，西蒙斯研究的甚至不是应用数学，而是理论数学，而且是最不实用的那一类。那么到底是有人穿越回了西蒙斯的身体里，还是他有什么开了金手指的秘诀？

用数学模型捕捉市场机会，由电脑做出交易决策，是这位超级投资者成功的秘诀。西蒙斯当然不会告诉我们他的模型预测参量是什么，但他还是慷慨地对外界分享了他的成功秘诀。

比如，出色的员工，很棒的基础设施，开放的环境，并且尽量让每个人根据整体的表现获得薪资。这些作为公司经营而言只是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看起来这么普通，而西蒙斯为何如此自信？

事实上，一些公司也运用模型，然而宗旨是，它们有一个模型，用这个模型得出的结论给交易员提供参考意见，如果他们赞成这个结论那就照着执行，如果他们不赞成，那就不执行。但这不是科学，更没有对数学的信仰。西蒙斯认为，你不可能模拟出十多年前当你看见市场行情数据时的那种感觉，而且回溯测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西蒙斯认为，如果要是真的靠模型去交易，那就完全遵照模型说的去做，不管你认为那个模型有多聪明或者是多傻。

所以文艺复兴是建立在基于数学的信仰之上的，他们百分之百依靠电脑模型做交易，做的业务从外汇、金融工具，逐渐发展到股票以及其他一切可以交易的、流动性强的金融产品。公司成立的早些时候，为了得到数据，西蒙斯派人去美联储影印利率的历史数据，那些数据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也不可能简单地从网上买到。为了得到区域性数据，他们又去手工搜集大量的数据，而且不是在大街上假装摆摆样子，或者去酒桌上刺探情报，而是确确实实做到了。而这些，身为读者或者投资者的我们，也能做到吗？

当然，教会西蒙斯成为大师的，除了数学的信仰，除了计算机的成熟应用，除了美国股市的长年走强，可能还有一次又一次交易亏损的经历。他自己曾表示，如果你做fundamental trading（基本面交易），那么某一天当你醒来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是个天才，你的头寸总是朝利于你的方向发展，你觉得自己很聪明，你也会看见自己一夜之间赚很多钱。然而第二天，所有的头寸都朝着不利于你的方向走，你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并能直面这些挫折，你很难把这种细微的心理感受描述得如此绘声绘色。

近些年来，文艺复兴每年能从交易中赚取超过70亿美元，但文艺复兴只有300人左右的员工。祖克曼估算，西蒙斯大约拥有230亿美元的资产，资产规模超过了埃隆·马斯克、默多克和史蒂夫·乔布斯的遗孀劳伦斯·鲍威尔·乔布斯等人。

然而金钱的数字并不能如实衡量和定义西蒙斯的一生。他把公司开设在美国长岛北岸一个平平无奇的小镇里，雇用了一群对华尔街的投资理论一无所知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但西蒙斯和他的团队却彻底改变了市场的玩法，一骑绝尘。这很像一群游客，手握粗陋的工具，背负微薄的给养，却在他们第一次登陆南美洲的时候就发现了黄金国，并在其中大肆劫掠，徒留那些历尽艰难的探险者目瞪口呆。

因此，《征服市场的人：西蒙斯传》不是简单的一本人物传记，也不是手把手教你如何通过量化投资来笑傲华尔街的投资秘籍，更不是兜售华而不实的成功学的消遣读物。其中更吸引人的部分还包含了一个和一群数学家的浪漫与激情，以及他们对投资心理的坚持与挣扎，对纷繁诱惑的世界的对抗与洞察，对信仰和运气的尊重与感恩。

《山海情》剧照。

# 扶贫，需要“马得福”，也需要“丁真模式”

**闵宁模式离不开剧中“马得福”这样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基层干部的付出与成长。藏族青年丁真走红背后，理塘政府所扮演的创新角色也让人欣喜**

文／梅丽莎

2021年2月25日，中国宣告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减贫目标。特别是近8年来，近1亿中国人摆脱贫困，相当于每年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

在此背景下，由正午阳光团队出品的主旋律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喜爱和欣赏，尤其是在以年轻人审美为主要依据的豆瓣上，该剧得到了极为难得的9.4分，一举跻身国内电视剧评分总统山。

与此同时，一位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藏族少年丁真，因为一脸纯真朴素的笑容意外走红网络，成为“新晋顶流”。走红后的丁真已成为理塘县的旅游大使，为当地旅游贡献力量。

《山海情》背后的闵宁模式，即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体现了“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既富口袋也富脑袋”等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精准扶贫、开发式扶贫经验。但闵宁模式离不开剧中“马得福”这样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基层干部的付出与成长。

而丁真的意外走红，则展现出在互联网时代，地方政府在扶贫方面所做出的创新样例。以下分开详解。

《山海情》讲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宁夏西海固地区“吊庄移民”的往事。这片土地山高水远、土地贫瘠、缺水缺电，曾被联合国粮食署评为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涌泉村的村民们世代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穷得“一天三顿，顿顿吃洋芋”“兄弟三人同穿一条裤子”。

但这还不是最让人绝望的，哀莫大于心死，扶贫最难是人心——那颗甘于贫困的心。相信很多在一线扶贫的基层干部都深有体会。

第一集马喊水去动员从移民区跑回来的七户人家，理由是怕吃苦，怕风沙，怕蚊子，不想给别人打工，当苦力，当孙子。最终聪明人大有叔说出了全村的心里话：反正政府不会让人饿死，到时候还是会给发救济粮，还得送到家里来。

扶贫真的太难了！用马得福的话说就是：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没完没了。

马得福，一个一心为民、简单纯粹的基层干部，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带领村民们吊庄移民，帮助村民们在戈壁滩上重建家园，脱贫致富。他扛得起担子、担得起责任，为村民们办了很多实事、好事。无论是挂职而来的陈县长，还是带来致富手段的凌教授，抑或为水利工程奔波的张书记，都需要马得福这样的基层干部冲在前面，伴在身边。

扶贫不是爽文，马得福的工作难以开展是全方位地难，一方面是村民工作难，另一方面，他的仕途也并不顺利，刚上任就和供电站耗上，后来为了帮村民解决供水问题，直犯忌讳找上面的大领导。再到后来，为了帮助村民彻底摆脱贫困，他率先带头种菇，没想到刚说服村民种菇就又遇到了滞销难题，于是他又不顾阻拦在大会上当着领导的面揭露蘑菇滞销臭掉的真实情况。

可以说，自马得福当上代理村长以来，困难就层出不穷，接踵而至。但马得福所体现出的执着，背后早已将仕途抛置脑后，奔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

其实，马得福就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基层干部的缩影，他们一心为民、简单纯粹，凭着满腔赤诚和一股子韧劲带领人们建设家园，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消除绝对贫困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工作，美国投资大师查理·芒格曾说，自己很钦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如此迅速、如此长久地摆脱贫困”。而这种成就，需要有更多的马得福，一直和村民工作、生活在一起。

与此同时，扶贫需要更多创新。通过媒体报道，让公众火速“圈粉”，丁真的走红虽然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尤其是理塘政府的实践，给没有能力招商和培育独角兽公司的地市县政府做了一个示范：如何在互联网经济中，运用好政府资源和掌握的要素，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

特别是，理塘政府并没有过度开发和压榨丁真所带来的明星效应，而是让丁真本人得到了接受教育、提升自我认知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构建丁真在聚光灯下的光环和当地居民普惠增长之间的纽带。这样避免了让丁真这样的“网红”成为保质期极短的颜值招牌，同时也让丁真不会成为一个个案，还会让当地更多丁真式的个人获得自我觉醒和实现的机会，并将这种机会和更多民众的福祉相联系。

更重要的是，理塘有了在丁真身上的实践和经验，就可以以此为抓手，打破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和少数民族青年就业壁垒，从而从根本上打破对教育的传统认知，推动所在地区和阶层“转变经济模式”的抓手。

而随着丁真热度的不断升级，还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央和地方如何配合，把个人发展、赋能式扶贫帮困、共识塑造和构建等从微观到宏观的治理任务共同推进。

# 艺术收藏交易新格局正在形成，中国拍卖行如何接招？

收藏新世代正在主导未来20年艺术市场，而中国90后藏家是其中重要的力量。但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孕育新生的中国拍卖行如何抢得先机。持续在供应链端取得优势、占有高端拍品、多元化布局竞争新序列等等，都会直接刺激市场份额的上涨

文／王林娇

## 纽约古代艺术收藏正在退潮 另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启

3月初，就在2021年全球艺术品市场首场大拍——纽约亚洲艺术周前夕，著名古董大鳄James J.Lally（蓝理捷）宣布关闭其在纽约经营35年之久的画廊LALLY&Co，这位在古董行业德高望重的老派绅士此番告别，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在中国和美国传统艺术交易圈引发热议。

随即，活跃在古代艺术品鉴藏一线的资深人士“花市暂得楼”梁晓新和笔者说道，蓝理捷一定是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才做出了这个决定，看来纽约的情况真的不太好。

青铜饕餮纹方罍（商）
估价：50,000-80,000英镑
后会可期：Roger Keverne Ltd 告别拍卖专场

一波未平，时隔三日，伦敦传奇古董商Roger Keverne在逾半个世纪收藏和交易之旅后，亦选择退场，现时其全部中国艺术雅器精品八百余件，将全部委托邦瀚斯拍卖，于5月和6月分别在邦瀚斯伦敦总部举行两场专拍，值得注意的是悉数拍品将以无底价的形式上拍，可谓是全身而退。

“这不是一个孤例，以蓝理捷为代表的顶级古董商退出，说明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品经营行业，在欧美都面临着相似的情况。反过来也说明欧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热衷于购买艺术品的文化精英和中产阶级，可能已经对严肃的古代艺术失去了兴趣，他们的口味已经转变了，那么未来就由中国人、东方人来接替了。”梁晓新说。

纽约和伦敦，这两个一度盘踞世界艺术品交易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城市，也让人感叹中国古代艺术品在西方将无以为继，这也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另一个时代即将在中国开启。

北京和香港，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发布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报告（2020下半年）》数据，2020年度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总额为395.35亿元，其中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斩获210.5亿元，港澳台地区则是121.12亿元。凭借超强的艺术市场调节能力、增长势头强劲的北京，成交额同比增长3.77%，是唯一一个年度实现正增长的城市。

但2021年，北京拍卖市场将面临着来自行业内外的压力和挑战，过往近30年来飞速发展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矛盾在新冠疫情下暴露出来，矛盾也愈发突出。

比如艺术品资源有限且近十年持续调整的艺术品市场，在一轮又一轮的优胜劣汰中，交易重镇北京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超强生力军的加入，使得北京拍卖市场的梯队重新调整。北京保利和中国嘉德分别以55.55亿元和48亿元的成交总额牢牢占据市场第一梯队。

但以企业资本为背景的拍卖新生军亦杀出重围，比如曾在拍卖江湖叱咤风云的赵旭，与风云人物李伯潭联合创办永乐文化，2020年度一举斩获33亿元；早在2016年度就加盟盈峰控股集团的华艺国际拍卖，背后力量正是大名鼎鼎的美的集团，2020年度挥师北上即获得28亿元成交佳绩。

新东方俞敏洪为代表的企业家团体也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加入北京十竹斋拍卖，越来越多的拍卖人表示，未来会持续压缩自己在拍行中的股份占比，把更多的份额用来吸引企业家，这一点大小拍卖行中都有体现。

## 2021年文物艺术品仍然是“卖方市场” 最焦虑的问题能否持续征集到好作品

而对头部拍行来说，亟须解决的挑战依然是内循环下的征集。“现在最焦虑的问题仍然是征集，能不能真正拿到好作品，这依然是摆在眼前一件困难的事。 2021年最重要的还不是买方市场，仍然是卖方市场，我们如何在交通受限、旅行不自由的情况下持续征集到好作品。”中国嘉德拍卖胡妍妍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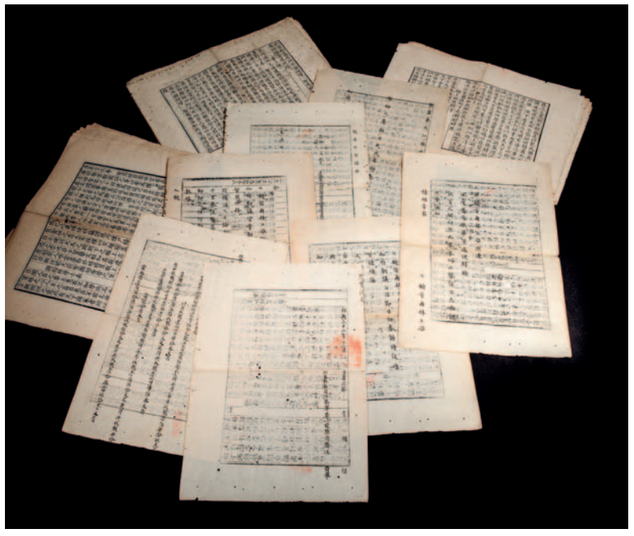
张大千《玉女进酒图》
立轴 设色纸本 91x45cm
中国嘉德2021年春拍呈现

的确，眼下正值2021年春拍季征集期，中国嘉德、北京保利等大型拍卖行选择在铁路沿线以及传统收藏热门的城市进行公开征集，并扩大城市范围，定向拜访早在农历新年前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刚刚结束上海站的公开征集，氛围还是一如既往，多多少少都有些收获。过去一年没有公开征集，尤其是一些老户们拿出了不少作品，但都是小东西，

Roger Keverne旧影
邦瀚斯拍卖供图

大件不多。”一位拍卖行业务人员在奔赴下一站的路上时和笔者说道。

疫情后，似乎拍卖行传统的“见人见物”的工作模式，全部被打破，利用互联网，“云见面”“云征集”是一种新的尝试，2021年海外云征集亦是如此。



《宋贤书札册·王文公文集》
成交价：2.635亿元
北京永乐全球首拍

“2020年疫情之初，客户和我们业务人员都寄希望于下半年就能恢复正常，交流和沟通很多事通过邮件和电话‘虚着谈’，处于务虚状态。但今年的重点征集任务，就是‘落地’，通过云征集，在互联网上搭建一个和客人见面的场景，把务虚落实到签约。”胡妍妍说。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往往会出现高估价作品以及生货，而高端作品对于拍卖行的市场份额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

笔者统计了2020年度超高价位拍品成交情况，全球范围内最贵的10件作品，只有2件越过了5000万美元的门槛，而在2019年度，这个数字是9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纽约几乎包揽所有高价的垄断态势不同，2020年排名第2、第5、第6和第8的四件拍品均来自亚洲，是历年来上榜数量最多的一次，在疫情中率先恢复秩序的亚洲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支点。

另一组中国境内近十年的头部作品成交数据显示，进入亿元时代之后，2020年度亿元拍品数量达到了峰值，共计诞生33件成交过亿元的拍品，这也维持了整个交易市场的基本排面。

聚集到中国嘉德拍卖，作为专注于高端艺术品的拍卖行，明星作品是不可或缺的。“每年25%的成交额是单价1000万以上的拍品，单价10万以下的作品，从数量上看是不少，但是市场贡献却不大。”胡妍妍用数据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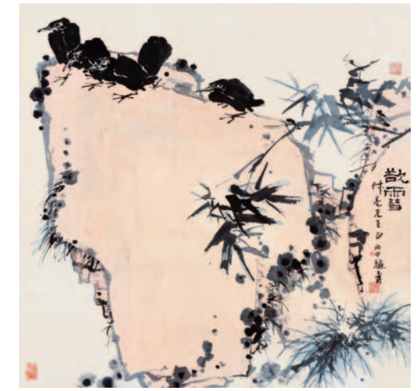
但高端估价的拍品征集难度也是最大的，相较于海外征集不能成行而言，国内的顶级藏家和艺术家家属，多是尖货儿的聚集地，基本上是行业内的透明信息。客户数量有限，并多重合，如何才能说服他们委托，也变得越来越难。

困难，不止征集环节，还有来自熟货的挑战。

拍卖行业面临着很多问题，最尖锐的当然是真伪问题，但是经过了近30年的时间，很多作品其实在市场上已经出现过，大家讨论之后并且有了结论，真伪问题可能退而求其次了，下一个问题其实更难回答，这件作品到底是什么价值，并且必须量化出来。

以2020年度中国书画26件成交价超5000万元以上的拍品为例，有两次以上拍场易手记录的作品比例高达46%。那么，当一件尖货儿一次又一次上拍时，藏家依然能为之出价的判断是什么？这无疑是放在从业者面前一个重要的问题：短时间内拿到一件已经在交易市场上露过面的作品，如何重新组合挖掘文化价值，延展作品的市场价值的空间。

傅抱石《玄武湖之春》
设色纸本 立轴 1962年作
110×52cm
北京保利2021年春拍呈现



潘天寿《欲雪》
立轴 设色纸本 1956年作
82×81cm
华艺国际（广州）2021春拍呈现

## “长尾”要来了？网拍内容更加多元、财务贡献变大

与此同时，2020年度以来的艺术品线上交易大爆发，也让情况有了一些改变。尤其是网络拍卖的表现，也让艺术行业看到：未来金字塔顶端和宽大的底部，都是大有可为。而长期以往拍卖行业的“二八定律”之后可能会转变为“长尾效应”，也许大家会更加实在一些，抓住所有机会，25%的高端要抓，5%的底部也要抓。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随着电子平台技术的介入，网拍越来越多，价位稍微低一些的作品对整个财务贡献在增加，“长尾”来了，对于从业者来说，可能会更辛苦。

网络拍卖多元化的内容更加适配于新兴收藏群体，这一点在苏富比网拍中表现更为直观。多种便捷渠道让藏家接触更多元化的藏品，苏富比拍卖2020年度获得新客户数量较之2019年上升27%，创15年的新高。网上直接销售更是发展迅速：逾70%的拍

上图：吴彬《十面灵壁图卷》
成交价：5.129亿元
北京保利15周年庆典拍卖

下图：任仁发《五王醉归图》
成交价：3.065亿港币
香港苏富比2020年秋拍
（备注：2016年北京保利拍卖中3.036亿人民币成交）

卖为网上专场（较去年升30%），全新推出之网上及手机功能，使得网上竞投比率高达80%。

财务贡献率上来看，苏富比2020年逾380场网上拍卖取得5.75亿美元的总成交额，其中超40%竞投者及买家为苏富比新客户，40岁以下之年轻买家人数较去年翻一倍。

自主搭建网拍交易平台的中国嘉德拍卖网拍EBIDDING也实现了突破。2018年首场网络拍卖成交额是509万元，2019年为1602万元，2020年中国嘉德网络交易平台就得到了释放，全年11场拍卖会，合计6000多件艺术品实现了1.8亿元的成交，这个成绩也超越了中国嘉德四季单期成交额。

“北京保利秋拍中，齐白石《松鹰》1437.5万元成交，正是出自于网络出价，也是保利网络同步拍最高纪录。”北京保利拍卖总经理王蔚说道，同时，北京保利网拍举行87场限时专场，成交金额突破2亿元。

伴随着艺术市场对互联网黏性的增大，拍卖行在2021年度也将会有全新序列，拍品数量变大，一个新挑战就在于必须要做更多的学术梳理和美学选择，而不是简单的把庞大的“货”抛向市场。

“网络交易看似机器在“管理”所有环节，似乎节省了人力成本，但是，针对艺术品拍卖市场，一场吸引人的拍卖，需要独一无二的有美感有历史有创意的作品才能成功，因此，特殊和稀缺决定了这个市场的数量有限，规模不可能无限放大，没有足够的规模，互联网的“节约成本”优势，暂时还没有显现出来。”一向对市场极为敏感的胡妍妍进一步谈道。

头部拍行在网拍布局中发力，也直接压缩了中小拍行的生存空间，2021年生存压力将变得更难。但拥抱互联网是当今流行语，也是每个传统企业展望未来时，无法回避的，不管你是否愿意，时代还是走到了这里。

# 上海红色记忆

## （1920-1949）

文／辛酉生

上海，
是党的红色起点。

淮海中路渔阳里、
兴业路76号、
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四行仓库、
思南路周公馆……

这一个个出现在党史中的
红色标记，
向后人讲述过去的故事。
或宏大，或细微

上海，中国东海之滨的超大城市，中国的金融中心、中国现代工业的摇篮。标志性的石库门洋房、丰富的海派文化、繁荣的商业、良好的生活品质和开放创新时尚的城市精神，共同构成了上海的城市标签。这些标签既可以概括上海这座城，又可以分别标记到城市里一个个具体的地标上。当我们去安放这些标签时，每每总能看到一个红色身影同时出现。这就是上海的另一面，红色的一面。

上世纪20年代，这座东方巴黎就已经烙上了红色印记。而从那时起，一股红色力量在此生根、生长，开始变革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

## 淮海中路渔阳里：决定成立一个党

1915年时，上海有一条街道被命名为霞飞路，以纪念一战期间马恩河战役的“功臣”，法国将领霞飞将军。45年之后，为纪念淮海战役，霞飞路更名为淮海中路。无论名字如何更迭，从1915年至今，这条路不变的是它的繁华。

淮海中路南侧有一片幽静的石库门洋房，叫做渔阳里。1919年6月，陈独秀因参与“五四运动”被捕，出狱后为摆脱军阀迫害，于1920年初来到上海。同时他也将《新青年》杂志迁移到上海，编辑部就设在渔阳里2号。很快，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一批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同志：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党，并起草了党的纲领。陈独秀还就党组织的名称征求北大老同事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认为应该叫做“共产党”。陈独秀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渔阳里2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同月，由俞秀松任书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渔阳里6号建立。还是在这一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

此时，不仅在上海，“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长沙、广州、济南，法国、日本都出现了中共早期组织，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和组织活动渐次展开。到了1921年3月，李大钊已然公开呼吁“C派”的朋友们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李大钊所说的“C派”正是共产主义者。

在这种形势下，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抵达上海，并开始与上海的共产党人李达、李汉俊接触。随后各地党组织接到上海发来的消息，要求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共商建党事宜。

为什么要选择上海作为建党之地？一方面，相对当时的北洋政府首都北京而言，上海不是政治中心，又有租界可做掩护。而且，上海交通便利，各省代表不论乘火车还是渡轮船都可以很方便到达。更深层的原因是，上海作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经济极为发达，汇集着当时中国最多的工人，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上海有得天独厚的思想发酵土壤。同时，自《新青年》杂志迁到上海后，这个中国报业、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也成为了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重镇和中心。

青少年参观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渔阳里。图/IC

## 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

由渔阳里向东南行进900米，是上海新天地。新天地以石库门老建筑为依托，加入时尚元素，成为上海今天最潮的休闲街区，相比淮海中路式的繁华多了几分青春色彩。100年前，这里同样涌动着青春的气息，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要在此开创一番前所未有的事业。

新天地北侧的兴业路76号，曾经的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是早期共产党人李汉俊和其兄长李书诚的寓所。1921年7月，陆续有人从各地赶到这里。23日，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的李达、李汉俊、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等13人和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齐集于此，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身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事未能参加会议。从23日开始，代表们展开热烈讨论，直到30日，一名陌生男子闯入会场又匆匆离去。有长期秘密斗争工作经验的马林判断，此人可能是法租界包探，建议会议马上终止，代表迅速转移。果然，很快法租界巡捕就搜查了会场。代表们在李汉俊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转到嘉兴南湖完成最后一天会议议程。这次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从此正式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 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共二大会址

还是从渔阳里出发，这次向北行进480米，穿过延安路高架，就是延安公园。随着100多年来上海高度城市化，原有的天然植被和自然空间逐渐消失。因此，上海自开埠之初就重视公园建设，建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本世纪以来，上海更是加大公园兴建力度，为市民提供充足休闲空间。延安公园所在地，也曾是一片片房屋。公园建成之后，唯一保留下来的是原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共早期党员李达曾经的寓所。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1922年7月12日，来自各地的12名代表再次聚集到上海，来到李达寓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虽然参会人数没有大的变化，但全国党员人数已从80余人发展到195人。吸取一大被巡捕冲击的教训，此次会议采用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结合的方式，8日议程中一共召开三次全体会议。

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做出了规定，并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次会议还对当时的中国经济政治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一方面已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一方面“在政治方面还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3年，因为国共合作原因，中共三大选择在国民党大本营广州召开。会后，考虑到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区，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决定将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并将中央机关设在三曾里一座二层石库门房子里，作为党中央秘密办公场所。

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址选在虹口区东宝兴路。这时中共党员数量也已经扩大到994人。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了要求复工的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此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学生、工人于当月30日到租界举行大规模反帝示威活动，英国巡捕悍然开枪打死13人，史称“五卅运动”。五卅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共产党员人数从1925年初的不到1000人，发展到年底的1万人。

*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图/视觉中国*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图/IC*

四行仓库抗战文物遗址纪念馆。图/中新

## 武定路930弄14号：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壮大，国共合作加深，面向北洋军阀的北伐运动取得不断胜利，而这时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出现“限共、反共”的声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政变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武汉，9月再次迁回上海。

武定路930弄14号一栋三层砖木结构的楼房，亭子间、老虎窗、天井、晒台等沪上老牌建筑元素一应俱全。楼前晾晒着衣物，停放着车辆，还会时不时飘来饭菜香气。如果没有门口上海文物保护单位的牌记，实在想不到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后，为应对复杂局势和承担保卫工作，成立了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地点就设在武定路930弄14号。1931年4月，原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由于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及时将消息传给身在上海的李克农，又由李克农将情报连夜通知到陈赓、周恩来，当清晨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冲进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时，人员已全部撤离。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等众多党的骨干因此免于遇难。由此，党中央再次迁离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

## 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上海保卫战旧址

此后的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月，上海遭受重创，包括三曾里党中央机关和四大会址在内的大批建筑被炸毁。停战之后，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在苏州河畔修建了钢筋混凝土建筑四行仓库。谁承想，这座仓库在几年之后会成为中国军人血战之地。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打响。10月，日军南下上海，谢晋元部与日军在四行仓库展开殊死搏斗。战斗持续了五天，至今四行仓库外墙上的累累弹孔仍叙说着当时交火的惨烈。11月12日，上海沦陷。

现在四行仓库旧址已改建成为四行仓库纪念馆，向人们述说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与纪念馆毗邻的则是创意科技园区，作为历史建筑改造、更新利用的典范，吸引着新的智慧和创意。

周公馆。图/人民视觉

## 思南路周公馆：中共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上海看洋房必去思南路，二十几栋洋房和成荫的法国梧桐，构建起思南路别样的风景，也成为消耗手机内存的好去处。1946年，上海已走出抗日战争烽火，而另一场较量却正在思南路上展开。思南路73号院外，不时有人穿梭，街对面的楼房早已架设起望远镜，24小时监视73号院内的动向。这座被称为“周公馆”的院子有着怎样的秘密？

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为设立驻沪办事处，共产党代表团租下思南路73号。但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于是代表团索性在门前悬挂起了周公馆的名牌。1946年11月周恩来返回延安，由董必武全权负责周公馆工作。中共代表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革命斗争和统战工作。

周公馆离董必武参加一大的兴业路只有1200米。25余年后，董必武又回到了他的出发点。很快中国共产党就要像将霞飞路改为淮海中路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改建这座十里洋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2020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3.87万亿，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经济实力保持全球城市前列。

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岁生日。上海，党的红色起点。60多年过去了，这一个个出现在党史中的红色标记，已经变成了一座座纪念馆，向后人讲述过去的故事。或宏大，或细微。

# 武汉的老城新生

多牛书店中正在举行一场现场音乐会。本地民谣歌手冯翔用武汉话演唱《汉阳门花园》——“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伢”……方言中关于武汉的事物很容易引起共鸣，演唱结束后意犹未尽的观众久久沉浸其中

文、图/Richard

从空中俯瞰汉口江滩日落，有种电影的既视感。

连续下了若干年天雨后，天终于放晴，并伴着气温回升。如此难得的好天气又赶上周末，对于武汉的早春尤为珍贵，特别是汉口区的黎黄陂路。

只有六百多米的黎黄陂路是汉口甚至全武汉最出名的一条路。一百多年前，这一带是俄租界，街两旁巴洛克风格的房子都建于那一时期。这些建筑多为四层，除了民宅，还有医院、银行、教会等当时的各种公共设施。1946年1月1日，国民政府收回主权，这条当时名为夷玛街的道路，和周围那些有着绕口音译名字的道路一起被更改，黎黄陂路的名字始于那时。

路名来源说法不一。一说是1900年修建时，多数筑路工人来自黄陂。另一说是两任民国总统黎元洪是黄陂人，路名取其姓氏与籍贯。岁月流逝，留下的除了名字，还有路上的建筑。上世纪末，政府将这里辟为“街头博物馆”，老房子纷纷被修缮，一些重要的在门前立起铭牌，向人们讲述它们的过往。那以后，慕名而来的人逐渐增多，一些人租下闲置老宅的底层，开了咖啡馆或餐厅，于是人们有机会在吃喝之余，近距离感受古老建筑的风貌。

## 〖老街烟火气〗

一大早，路旁的店铺就忙碌起来。因天气不佳收起多日的户外桌椅被重新擦拭干净，桌上新铺了熨烫平整的布，花瓶里插上了鲜花……透过头顶梧桐树上残存的叶子，斑驳的阳光打下，让周末格外美好。一切刚收拾停当，就有顾客陆续上门。虽然此时坐在户外还是有点冷，但一杯咖啡就轻易解决这个问题。

早到的客人坐下时，住楼上的街坊也开始了他们的一天。尽管黎黄陂路早就被辟为步行街，石板路禁止机动车通行，但满街店铺的楼上，很多依然是普通民居。

这也正是这条街吸引人的地方——它是活生生的，时尚与市井共存。我坐在街角一家咖啡馆门前，就在对面那个室内有巨大柴火烤炉的意大利餐厅楼上，一扇朱红色圆拱形木框落地窗敞开着，有人走出来，站在外面仅能容下一人的露台上。这样的画面很像电影中的场景，人物应该是一位穿三件套西装、头发被发蜡服帖地固定在脑后的俊朗男子正在抽烟。不过在眼前的现实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穿着睡衣的女士，手中正拿着牙刷刷牙……这栋房子的旁边，是一条深邃而狭窄的长走道，里面一位上年纪的男士正用竹竿将被子挑高，小心翼翼地搭在头顶上方的晾绳上，动作娴熟而充满仪式感，就像在升旗。

黎黄陂路人流在白天时持续增加，逐渐变得喧嚣而有些拥挤时，周围几条名声没它响亮的街巷此时惬意得刚刚好。

“最正宗的巴黎咖啡店”，与黎黄陂路相交的珞珈山街街角，一家咖啡馆的窗口处这样写道——言辞中透出法国人的自信与自大。这里的主人是一位法国人，已经在武汉生活了十年以上，他的咖啡馆在武汉小有名气。他的同乡们坐在咖啡馆门外仅能摆下的一张桌子前，正热热闹闹地享受着周末和美味，时不时地，其中几位举起香槟碰上一下，把气氛搞得很嗨。“那几棵大梧桐树很像巴黎。”其中一位这样说，言语间带着一丝乡愁。她说的梧桐树后面是一个小公园。我顺着幽深小径走入其中时，两个人坐在石桌前，棋局正杀得难解难分，后面五六个围观者分为两组，各自为代表支招助阵。小公园的一边就是当年的高级住宅珞珈山公寓，虽然房子略显老旧，但从立面的装饰和窗上的雕花，仍能看出其建造时的讲究。公园延珞珈山街走向展开，本身闹中取静的氛围和它周遭的烟火气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比黎黄陂路混搭得多，刚才的咖啡馆边，是价格便宜但人气十足的卤味店和早点铺，再隔着一个人气网红甜品店，重庆江湖菜和神秘地藏身二楼的日本喫茶比邻而居。从傍晚开始，珞珈山路的人气逐渐超越黎黄陂路，彼时，这些餐厅纷纷将桌子摆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烤串、火锅和湖北菜的辛辣在空气中飘散，成为留出过往人们脚步的最好武器。

骑行老街，最惬意不过。

## 旧工厂，新宝藏

武汉当年有“东方芝加哥”之称。就像芝加哥有密歇根湖，武汉因长江及一众湖泊而繁盛。关于这段历史，江汉关博物馆中有着详实记载。博物馆位于汉口轮渡码头旁的显眼位置，这座矗立长江边曾经的海关大楼变身博物馆。博物馆中记载着武汉的旧时光景，在二楼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里，展现了近一个世纪前平和打包厂热火朝天的场面——一包包棉花在巨大的机器中被包装好装车，从码头上船发往各地。

当年的打包厂如今还在，从博物馆步行10分钟，就能看到位于青岛路10号的工厂旧址。虽然早没了机器轰鸣和人声鼎沸，但这栋占地广大的四层的红砖建筑仍然是整条街上最抢眼的地方。厂房变身武汉如今最热门的文创园区，并且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多牛世界。

鹅社书店艺术馆占据多牛世界一层最显眼的位置，我去的时候，书店中正在举行一场现场音乐会。本地民谣歌手冯翔用武汉话演唱《汉阳门花园》——“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伢”……方言中关于武汉的事物很容易引起共鸣，演唱结束后意犹未尽的观众久久沉浸其中。

“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会有类似的主题活动。从新书发布到非遗主题交流。”工作人员说。这个活动空间平时是咖啡馆。而书店入口处，还有一个小型画廊。多样的形态让其集美术馆、书店、咖啡馆于一身。对了，书店最里面还有个市集，集中的一片被划成一个个小摊位，里面展示出售的，从潮牌到手工皮具，都是百分之百的武汉制造。

这个文创园区的精彩远不止一家书店。在我看来，光是这个老建筑本身，就有无数值得挖掘的地方：金属风的各种阀门、开关分布在各个角落，恐怕现在没人能准确说出它们的作用；被黑色金属包裹的楼梯绵延向上，置身不同高度，能感到不一样的立体空间感。顶层一个空旷的展厅中放着成堆的椅子，我透过窗户看了又看，才确认它并不是有意布置成这样的装置艺术，而是一个未完工的现场……

在楼顶的一角，满是巨大绿植的露台展现出与整个建筑工业风完全不一样的风情，我在这个绿意盎然的角落远眺，眼前的风景中既有高楼大厦，也有老房子的红屋顶。当我再次将目光收回时，无意间发现楼下一张巨大的钢窗内，两张沐浴在阳光中的桌椅格外动人，于是走下去寻找，原来那是一个摄影师开的咖啡艺术实验室，有香醇的咖啡和漂亮美味的甜点。看来这个老厂房真是一个宝藏，随时有可能发现新宝藏。

鹅社书店很受人喜欢。

夜晚喝一杯，品尝武汉魅力。

## 隐秘美味

温暖人心的美味总是藏身不起眼的街巷中，三镇民生甜食馆是典型代表。从1957年开业以来，位于胜利路的这家小店就是一代代武汉人的心头好。不要被名字误导，这里除了甜食，还能找到各种地道的武汉小吃。

我错过了“过早”的时间，在下午才来，但仍然能通过坐满的人感受到这里的受欢迎程度。为了多尝几样不同食物，我没有点已经吃过几次的热干面，而选了三鲜豆皮、烧梅、糊米酒和面窝。收款柜台有了电子支付，但除此之外的感觉和几十年前无异：付款后得到几个不同颜色的圆形塑料牌，将它们分别递到不同窗口，装在绿色硬塑料盘碗中的食物递出。餐具简陋没有装饰，但好味道足以让人忽略这点：烧梅与烧麦类似，只是薄薄的面皮与肉馅之间隔着一层糯米，它吸收了肉馅的油脂，又给本身赋予了一层丰腴。三鲜豆皮外层的鸡蛋被煎得金黄，馅料饱满得快要散开，一口咬下，表皮的焦脆和馅料的鲜美多汁融为一体，此时，喝上一口“名不符实”的糊米酒恰到好处，那并不是酒，而是混合了年糕、醪糟的甜品，汤汁的甜味和豆皮、烧梅搭配得刚刚好。

和胜利路相隔不远的车站街因为大智门火车站而得名，虽然那个位于这条街尽头、古色古香的老火车站早已荒废，但整条街因为餐厅林立而人气旺盛。我的目的地不是这里，而是跨过火车站身后宽阔京汉大道的18号酒馆。

作为武汉的第一家精酿啤酒馆，18号酒馆藏身在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下已经10年了。从当初人们不知精酿为何物，到产品屡获国际啤酒大奖，产品进了超市，这家店的模样一直没变。冬天似乎也不能阻挡武汉人对啤酒的热情，推门进去，我看到整个酒馆中几乎被坐满，只能在吧台角落里找到一个位置。我分别喝了跳东湖IPA、武麦小麦啤酒和血滴子帝国世涛，跳东湖IPA浓厚的酒花香味、层次丰富又恰到好处的苦度以及绵延回味最为出色。相比啤酒，下酒菜同样出色，小小一份武汉小羊排带来强烈冲击，煎得软嫩的羊排被厚厚一层辣椒包裹，刚一入口，干浓的辣简单粗暴，让口腔到胃成为火辣辣的一条线。虽然是一款西餐，但它却被赋予了经典武汉菜的味道——这样的干辣足以消减室外夜晚的湿冷，可以就着再来上一大杯冰啤酒。

# 桃花坞年画：贴在门上的民俗风情画

文/雷虎 图/阮传菊 桃花坞年画博物馆

2006年复制 神荼郁垒（门神）乔兰蓉制作

桃花坞年画，是孕育于才子佳人聚集地姑苏城的民间艺术，
把文人画的风雅用民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述

古时，桃花坞大街是苏州才子聚集地，桃花坞是活在诗画中的风流；而年画在人们的印象中，和春联是同一种类型，只不过是过年时贴在门上表达吉祥的装饰——桃花坞年画是刻在纸上的民俗。而桃花坞年画，则是孕育于才子佳人聚集地姑苏城的民间艺术，把文人画的风雅用民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述：表达祈福迎祥的《一团和气》《花开富贵》；用来驱凶避邪的《神荼郁垒》《钟馗捉鬼》；说时事风俗的《洋灯美人》《苏州火车开往吴淞》；讲戏曲故事的《三笑姻缘》《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一幅年画，就是社会的一扇窗，透过它我们能看清世间百态。难怪《汉声》杂志创办人黄永松说："假设桃花坞年画有500张图，我们的编辑需要把500张的图都解构了，带出它的能量信息，把文化的细节都抓出来，再归纳，这样你就能够看到中国人是如何表达喜怒哀乐的。"

年画，素来有"南桃北柳"之称。世间精品莫过于杨柳青与桃花坞。如果说杨柳青年画是粗犷的北方大汉，那么桃花坞年画就是精致的江南美女。两大派系的年画不分伯仲、各有千秋。而桃花坞年画相较于天津杨柳青，用雕版勾勒出底图，上色则全部用人工，桃花坞年画用时、用工都要省事得多。桃花坞在清乾隆年间的鼎盛时期，每年销量达百万张，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年画品种。不仅行销全国，还出口到日本，影响了日本浮世绘的发展。

传说最早的桃花坞年画作品，即是唐伯虎作的《风流绝畅图》。虽然这有扯虎皮做大旗之疑，但是也道出了桃花坞年画的缘起——唐伯虎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桃花坞年画则和吴门画派为代表的文人画有很深的渊源。

2007年复制 清代《一团和气》孙一波制作

2007年复制 清代《麻姑献寿》乔兰蓉制作

龙凤呈祥

百子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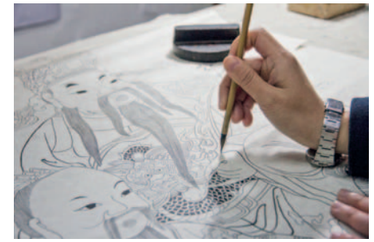
张仙射天犬

双美爱花图（海外收藏）

桃花坞年画博物馆正门

桃花坞年画博物馆内景

制作过程中


画稿

刻板

印刷

姑苏阊门图

## 【画稿：吴门画意绘姑苏】

桃花坞年画的制作分为三步：画稿、刻板、印刷。其中，“画稿”步骤尤为关键，年画要表达的题材、风格在画稿时就定下了基调。而古时有“琴棋书画”之说，绘画是文人雅士的专利。旧时没有版权之说，制作桃花坞年画的工匠看到市面上有流行的绘画，就拿过来做自己制作年画的模板。从这个层面上讲，桃花坞年画的起源，是源自对名人字画的复制。但是以前对名人字画的复制，不像现在一般，一台电脑，一个鼠标就可以轻松搞定，而是要由而衍生出一套繁琐的工艺。

既然要复制名人字画，那当然就要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的唐伯虎，既在文人雅士之中有很高的才名，在平民百姓中又有极高的人气，加之晚年唐伯虎又在桃花坞一带隐居，因而唐伯虎的画首当其冲，成为了桃花坞年画制作的重要“参考”对象。而文人画表达的是文人雅士的审美取向，和年画的受众——普通百姓的品位有差异。于是慢慢地，桃花坞年画作坊就出现了专门为年画作画的民间画师。

王祖德家是桃花坞年画制作世家。桃花坞年画带给了他太多美好的记忆：父亲曾经边画《三笑烟缘》的画稿，边和他讲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晚上做恶梦醒来时胆战心惊，想到门上贴有《钟馗捉鬼》的年画后就宛如拿到了护身符；反映婚丧嫁娶的年画让他懂得了传统礼仪，说民间嬉戏游艺的年画培养了他的情操和趣味——年画之于王祖德就如四格漫画之于现在的青少年，是了解社会的最重要的窗口，给他留下了太多的童年记忆。年画失传对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王祖德不清楚，但是对他来说，意味着失去童年最好的伙伴，这是无法接受的。

从1958年起，王祖德就做起了祖传的年画手艺术。成为一名专业的年画画师，一画就是50多年。唐伯虎画桃花，是用吴门画意“摘桃花换酒钱”，而王祖德画桃花坞年画，则是用吴门画意手绘姑苏记忆。“画年画的画稿，不是画家作画，信马由缰，而是要注意和下道工序配合。线条要均匀、要细。不均匀，刻板就不流畅；线太粗，印刷时就会模糊。”王祖德细细地说道，“桃花坞年画还得靠年轻人，这么好的工艺需要传承。”

王祖德

岁朝图

## 刻板：拳刀岁岁刻梨木

画稿完成后，就进入了桃花坞年画制作最艰难的环节：刻板。中国的雕版印刷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到明初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逐渐演化出刻书和刻画两个品种。刻画开始时只是刻书的衍生品，主要用来给戏曲、小说刻插画。因为插画表现更为生动，更能为底层百姓所接受，因而慢慢独立出来形成版画这一艺术门类。而桃花坞年画则是中国版画最杰出的代表，因其精致的刻工而被称作“姑苏版”。

木板是雕版印刷的模具，因而对木板有极高的要求，一般都选择质坚硬，木纹细密的梨木为刻版材料。梨木要先入水池浸泡，待不变形开裂后，裁成一到二寸厚，和画稿大小相当的木板，用刨子刨平、砂纸磨光后，把画稿反贴，之后就可以刻板了。

如果说画稿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写意，那么刻板就是以拳刀为笔在梨木上工笔。表面上看，刻板是对着贴好的画稿照本宣科，但是拳刀虽小，却并不是人人都能舞得动的。画稿基本上都是由流畅的线条构成，刻板要想把画稿的韵味展示得淋漓尽致，线条也必须一步到位。要想在木纹细密的梨木上划线，拳刀要锋利，刻板者要有非凡的定力。因为稍不留神，只要一刀刻错，整个版子就前功尽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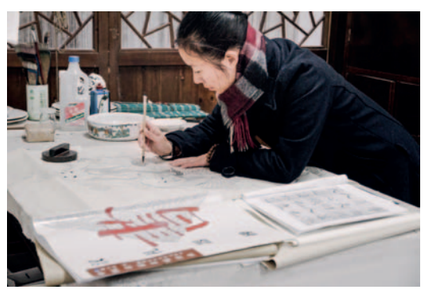
旧时，桃花坞年画为保证“术业有专攻”，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分工，刀工只负责刀工，把磨刀作为传内不传外的商业机密，一个学徒只有练倒十年才允许在大型版画上动刀。如今桃花坞年画青黄不热闹，桃花坞年画博物馆要求新人都必须成为“全能战士”，学会全套的年画技艺。

孙一波是新一代桃花坞年画刻板师中的代表人物，他第一次接触年画是在上大学时。1998年，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专门的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开始招收传承人。“当时看到年画时感觉非常震惊，苏州有这么好的民间手工艺，我居然闻所未闻。”于是孙一波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报名参加年画社。

一同进年画社的同学，最终都没迈过这道坎。有的同学听说一张A4纸大小的年画，熟练的刀工都最少要刻三个月后，就当场“知难而退”了；有的同学在刻板要完工时，刻错了一刀让整个雕版报废时，崩溃了；有的同学在得知要最少练习三年才能独立刻板时，不干了。最终只剩下孙一波一个人仍坚持战斗。支撑孙一波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很简单：“武侠片中，高手在走投无路时，在悬崖上用宝剑把自己的武功秘笈刻出来，太帅了。而桃花坞年画也是一门快要失传的绝技，我就要做这一行，用拳刀在梨木上刻《年画真经》！”于是，那时的孙一波成为了桃花坞年画唯一的传人，几个老师傅围着他一个人教，孙一波经常有种错觉：“我感觉自己就像《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而王祖德老师他们一帮人就是江南七怪。”

左图；孙一波

右图；乔兰蓉



## 套印：江南仕女贴花黄

套色工艺是桃花坞年画有别于其他年画的独特工艺。从刻板上印刷出来的年画是单一的黑色的，“就好比素颜的美女，而填套就好比给素颜美女上妆的过程”，给我们展示套印工艺的，是80后年画工艺师乔兰蓉。乔兰蓉2004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年画的创作、制作与研究，目前就职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是为数不多志愿从事桃花坞年画创作的年轻工艺师之一。

“每一幅成品年画都是色彩缤纷的，而一块套板只能给年画上一种颜色。所以，每印一幅年画，都要准备好几块套板。一般简单的年画只要6块套板，而最复杂的套板则需要26块套板。”乔兰蓉解释说。以印刷《双美爱花图》为例：仕女的脸和嘴唇是朱红，那就专门用一块套板刻出脸和唇，然后把套色板固定在桌子上，用刷子在套色板上刷上朱红色的水墨。然后用配套的塑料薄膜盖在套版之上，让涂过朱红的脸和唇露出来，再把上好底色的画稿贴上去，当朱红色的水墨浸染宣纸后，美女的脸上就抹上了“胭脂”，唇上就打上了“唇膏”。用同样的道理，要把仕女的衣裳染成黄色，就要刻出一块衣裳形状的套版；要让美女背后的鲜花变得娇艳欲滴，就得替鲜花刻一个套板……

每一次上色时，水墨都不能放得太多，放得太多宣纸会被浸透，用刷子“熨烫”时，宣纸易破。每一块套板，想要套色达到理想效果，要反复填套，少则3次，多则7到8次。而连续的填套，一定要让套色板纹丝不动，不然套色的过程中，前一次套色和后一次套色就会发生位移，造成重印和偏色。每一次套色时，再熟练的填套工都不可能一次成功，要不断地试验，根据套色板和画稿的位置不断调整位置。一旦调整好了后，就开始大量印刷，通常一次要印刷数百张。平均每填套一次用3张宣纸，而一幅年画一般要填套6种颜色，所有套色板填套下来，就要用18张。如果填套有26种套色板的年画，那就需要用72张。而桃花坞年画都选用的是最好的宣纸印刷，因此制作成本惊人。

“桃花坞年画虽然制作繁琐，但是这也让它具备了精致、典雅的特质。套色就是对镜贴花黄的过程，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套色再繁琐也都能接受了。”乔兰蓉说道。

花开富贵

渔家同乐图

## 桃花坞又见新版画

王祖德还记得儿时父亲卖年画的情景：那时年画是生活的必需品，是每家每户“打年货”时的必备物件。每到腊月，父亲就会挑着货担走村窜巷。报童卖报时高呼“号外”，而卖画郎则哼着“年画歌”，把年画的内容用歌词唱出来以吸引顾客。

桃花坞年画的历史巅峰时期在清乾隆年间。无奈，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围攻苏州不下，放火烧城。桃花坞年画作坊聚集的桃花坞大街，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大量珍贵的画版被付之一炬。桃花坞年画自此凋零。

如今，就算是桃花坞年画博物馆，集全国之力，也未收集到几块老版。在桃花坞年画资料室，王祖德向我们展示了一块他珍藏的老版：一块已经开裂的《花开富贵》。这是王祖德偶然得来的：上世纪60年代初，王祖德到苏北、安徽、浙江等地，开展桃花坞年画调查。和一位农户聊家常，农户得知王祖德在从事年画创作时，说自己祖上也是做年画的。他们的祖上每年过年时会到苏州卖猪，卖猪所得会换成年画回老家卖，后来看买的人太多，就专门到苏州学雕版技艺，自己回老家制作年画。祖上做了几代的年画，存下了大量版画。但是后来年画凋零后，那些版画就被当成柴火烧得差不多了，这让王祖德大为震惊。最终王祖德在农户家的猪圈中，发现了一块清代木板。反面已被刀砍出了一个凹槽，下面是雕工精美的《花开富贵》——偌大的桃花坞年画博物馆，仅存的一幅清代版画，居然靠着当切猪饲料的砧板这一身份才保存下来。

桃花坞年画，因为是面向普通百姓的艺术，被收藏的不多。因为各种原因，存世一百多件老画板绝大部分都保存在日本的博物馆中。王祖德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带领一群80后学徒复原这些版画。虽然老画板不在中国，但有了这些新画板，桃花坞年画就能流传下去。同时，他也在桃花坞年画博物馆中开办年画习训班，面向社会招收对年画感兴趣的业余学徒——作为一个桃花坞版画人，王祖德希望能尽己所能把桃花坞年画留住，留住一年又一年的福分，留住祖祖辈辈的故事。

ICBC 工银私人银行

传家之德 商业之道

我们深知
托起您的家族财富传承之任
必应不止于看到家族产业之上的宏伟蓝图
更须领会蕴藏于书信尺牍之间的世家精神

作为国内家族财富管理服务的先行者，工银私人银行秉承“诚信相守，稳健相传”的发展理念，面向金融资产5000万以上的私人银行客户，联手业界领先的信托机构、资产管理机构等合作伙伴，在业内首推家族信托综合顾问服务，为您的家族传承保驾护航。

网站 www.icbc.com.cn 服务热线 95588

ICBC 中国工商银行

Your Global Partner.
Your Reliable Bank.
您的环球金融伙伴

ICBC
中国工商银行
您身边的银行 可信赖的银行

www.icbc.com.cn